

#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果<sup>1</sup>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 一、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稳定经济增长、均衡收入分配、缓解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方面，社会保障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初衷是通过社会共济的方式来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化，减少经济活动中各种风险带来的收入波动和部分人群陷入贫困。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与政府税收并驾齐驱的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手段。

然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仍处于发展与改革阶段，其在调节收入分配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不仅要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而且要减少同一种保障制度中不同人群的差异性，进一步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过去的三十年，从 GDP 和家庭收入的增长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在 1978 至 2008 年间，GDP 平均增长率接近 10%，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 8%。近几年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超过 6% 的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到 2015 年底，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中国人均 GDP 达到 7500 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重建仍然相对滞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仍有不足。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不同人群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有着巨大的差别，甚至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尽管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却并成效不大。无论是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还是整个中国，收入差距远大于改革初期。整

---

<sup>1</sup> 本文是为中国-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项目（EU-China Social Protection Reform Project）撰写的研究报告。本文中需要地计算工作得到詹鹏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个国家现在的基尼系数估计大约为 0.47<sup>2</sup>，虽然相对于 2008 年的最高水平有所下降，但是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 0.30<sup>3</sup>，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同时，中国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从 1980 年的 0.26 上升到 2013 年的 0.40，城市的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16 上升至 2013 年的 0.39。

过去近四十年中，中国贫困率下降十分明显，但贫困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截至 2015 年底，中国农村仍有超过 5000 多万的贫困人口。这只是按照收入标准测算出来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多维贫困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会更多，因为仍有大量的农村家庭虽然其收入水平高于扶贫标准，但是受到疾病，自然灾害的冲击而陷入贫困。

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部分是因为劳动收入的比重降低，部分是因为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消费倾向降低由于人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支出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那些没有被社保体系覆盖的人群。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政府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为刺激国内需求已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措施集中在增加投资而不是刺激消费。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缩小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提高保障水平将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正在加速进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 年中国 13.67 亿人口中，60 岁及以上的老人 2.12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5.5%；65 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1.37 亿人，占比 10.1%<sup>4</sup>。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无疑已成为一个老龄化社会，而且在未来几年会不断深化。老龄化过程对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严重挑战，要求社会养老制度更加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为了解决上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建立一个全覆盖且公平的社会保障是中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一观点在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广泛共识。然而，如何使得社会保障制度更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更具有缓解贫困的作用，仍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优先考虑的问题。

本文下一节讨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而这些挑战是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也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第三节讨论了一些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其中特别强调它的调节收入分配和缓解贫困的作用。第四节是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了中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所起到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这里主要考察养老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

<sup>2</sup>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课题组在 2013 年进行了数据收集，估计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 0.47。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5 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 0.464。

<sup>3</sup> 见 Adelman 和 Sunding, 1987。

<sup>4</sup> 国家统计局（2015）《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第五节是国际比较，比较中国与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差异。最后一节是全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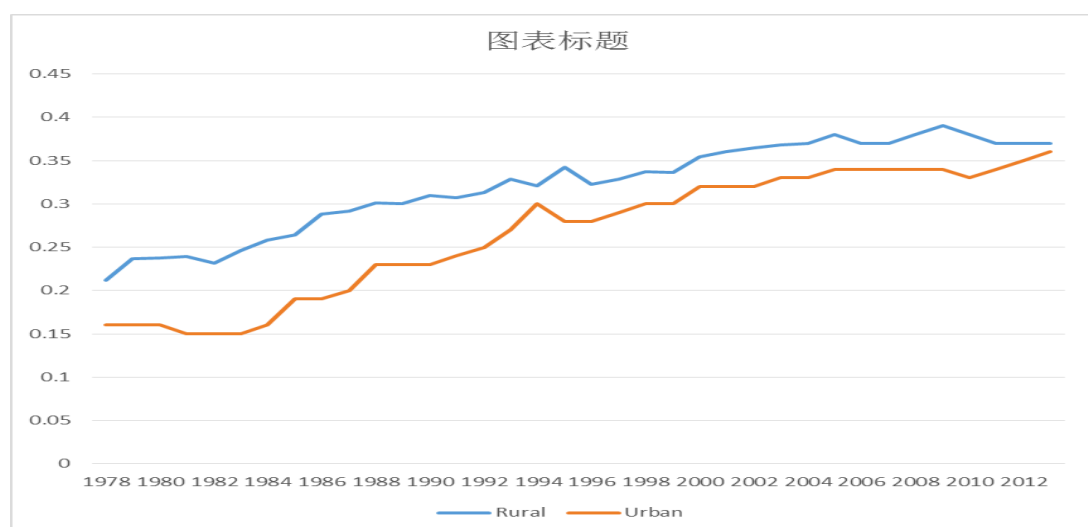
## 二、 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包括过大的收入差距、贫困、消费倾向的大幅下降、社会矛盾的增加和社会的不稳定。毫无疑问，这些挑战必须加以充分的认识和有效的应对。

### 1、 过大的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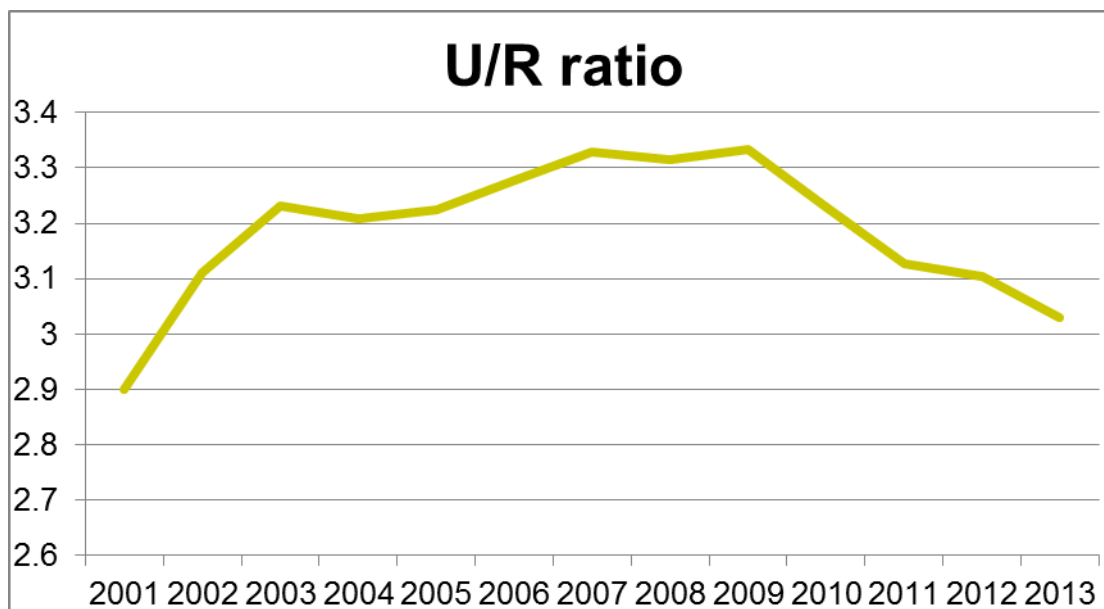
30年前，中国是一个平等主义盛行的国家，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城镇和农村实施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且政策偏向城市，这导致了城镇和农村家庭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获得以及人类发展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Riskin et al, 2001; Gustafsson et al, 2008)。对于收入不平等，不同的估计结果均说明中国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差距都显著增加了。比如，根据可比样本数据的估计，中国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了2013年的0.37，同一时期的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从0.22上升到0.38，如图1所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十五年同样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图2所示，以名义收入表示，2001年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2.9倍，2009年达到3.34倍，为历史上最高水平。在随后几年中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缓慢下降，近两年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率降为3倍以下，但是它仍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图1：中国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的变化，1978-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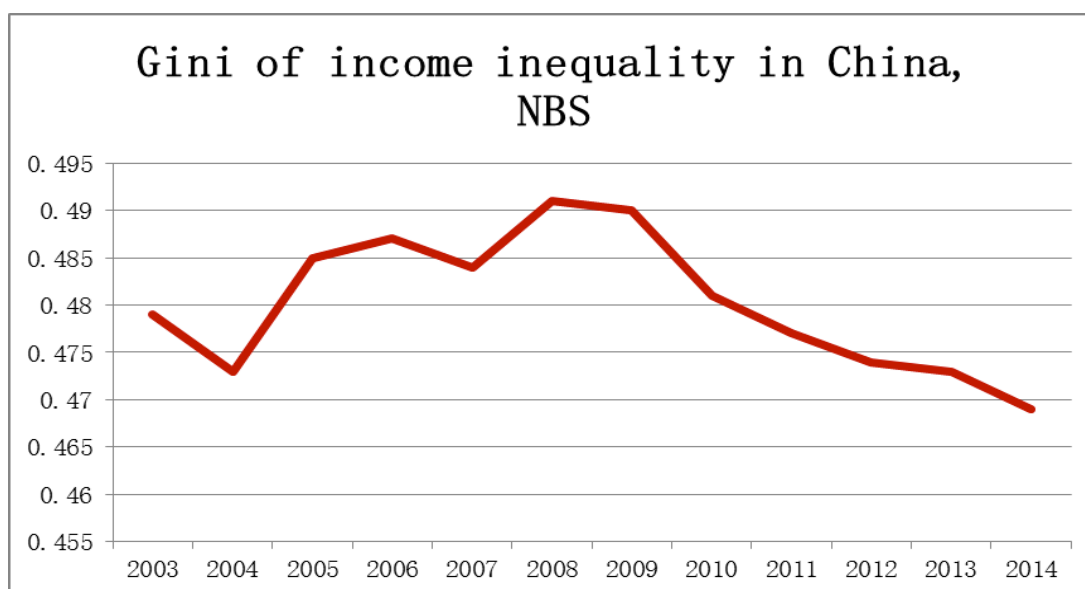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5

图 2：2001-2013 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14, p101

图 3：中国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2003-2014)



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社会发展公报》。

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1978-2008）基本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从 80 年代初的 0.30 上升到 2008 年的 0.491，达到了历史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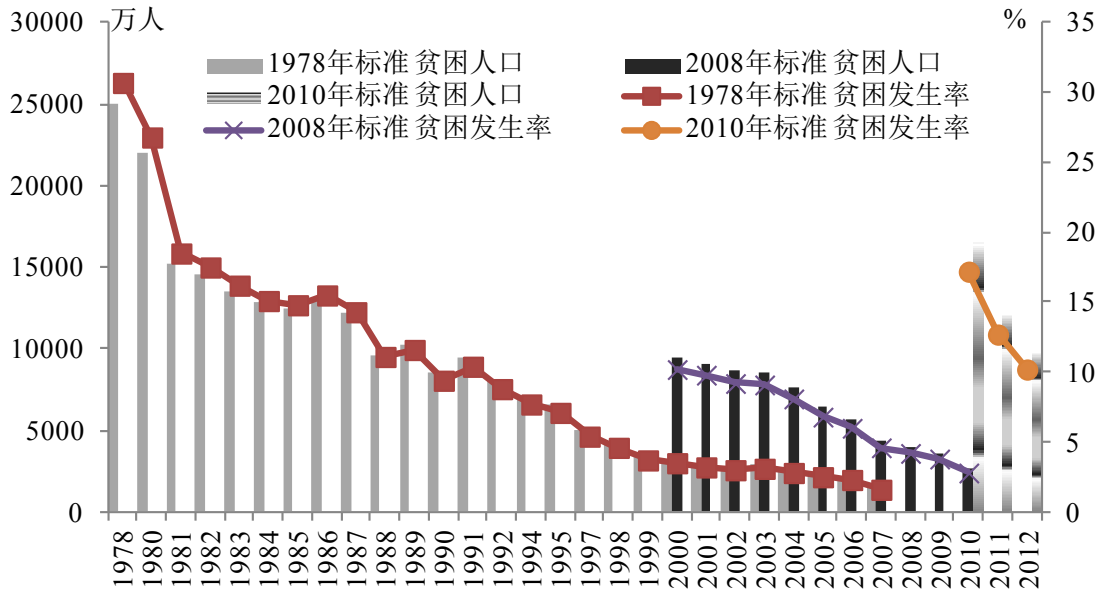
最高点。在后来的几年中，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有所控制，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到 2015 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 0.47 以下（见图 3）。然而，现今中国的收入差距水平仍处于高位水平，而且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没有建立起一个公平有序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因而收入差距出现扩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而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是其中的一项政策选择。

## 2、大量的贫困人群

毫无疑问，过去近 40 年中中国在扶贫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使用何种贫困测量指标，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贫困人口规模的下降已超过 90%，见图 3。在 2010 年以前，中国农村贫困线存在严重低估问题，导致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的低估。2011 年中国政府上调了农村贫困线，确定为 2010 年的贫困线为 2100 元/人/天。上调后的贫困线相当于世界银行提倡使用的 2 美元/人/天。根据新的贫困线，在 2010 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大约为 1.5 亿，贫困发生率为 17%。在过去 5 年中，农村贫困人口继续下降，到 2015 年已不足 6000 万。

然而，贫困仍然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众所周知，中国使用的贫困线只是以收入/消费为维度的，而不是多维的贫困线。如果按照多维的标准来估计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农村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会有很多程度的上升，除了收入/消费贫困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家庭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处于住房贫困之中。

图 4：基于官方贫困线测算的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



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历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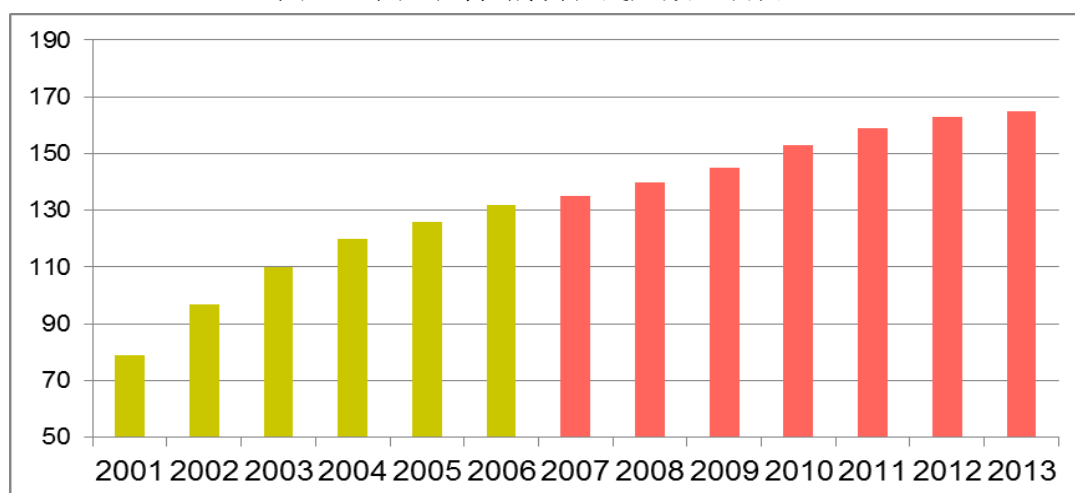
在农村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和儿童贫困是需要尤为关注的。与其他国家相同，中国的老年贫困和儿童的贫困发生率都要高于其他人群。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新形势下农村贫困人口的结构”研究报告，现今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比平均水平高出 5%，而儿童贫困发生率比平均水平高出 10%。针对这些特殊人群的贫困问题，仅仅解决他们的收入贫困是远远不够的，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 3、大量农民工流入城镇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就业和生活，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群仍是候鸟式迁移，往来于城乡之间。到 2013 年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人员（农民工）已接近 3 亿，其中的 1.7 亿就业于城镇（见图 5）。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非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如流动儿童和老人。加上这个人群，城镇中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总数超过 2 亿。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不足 60%，这意味着未来 20 年中城乡劳动力流动仍会持续下去<sup>5</sup>。大多数流动人口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流动性高但收入低，未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李实，2008；邓曲恒、李实，2009；李实，邢春冰等，2016）。由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在农村，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薪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方面均处于劣势。未来十年，解决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确实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sup>5</sup> 2015 年，大约有超过 2 亿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占中国总劳动力的 30% 左右。如果农村劳动力每年减少 1%，10 年后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仍为 20%。

图5 中国农村-城镇农民人数（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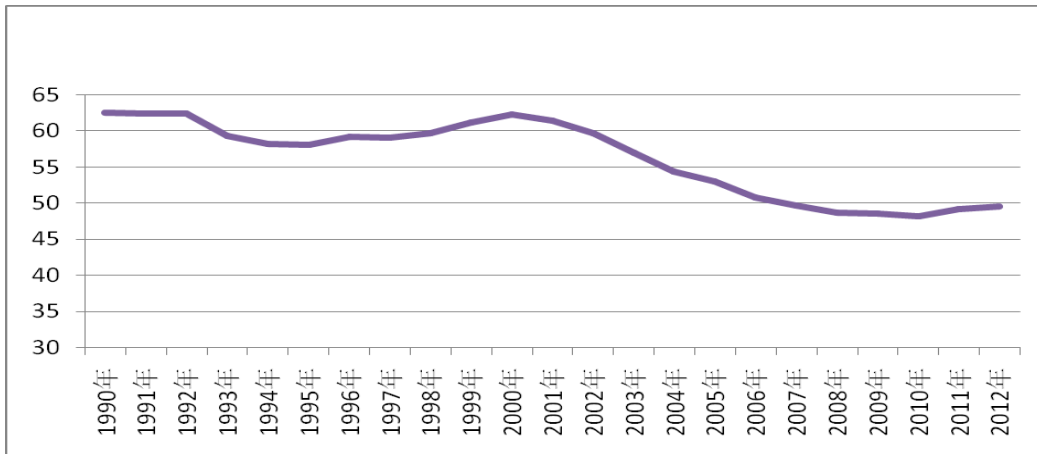


来源：历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

#### 4. 不断下降的消费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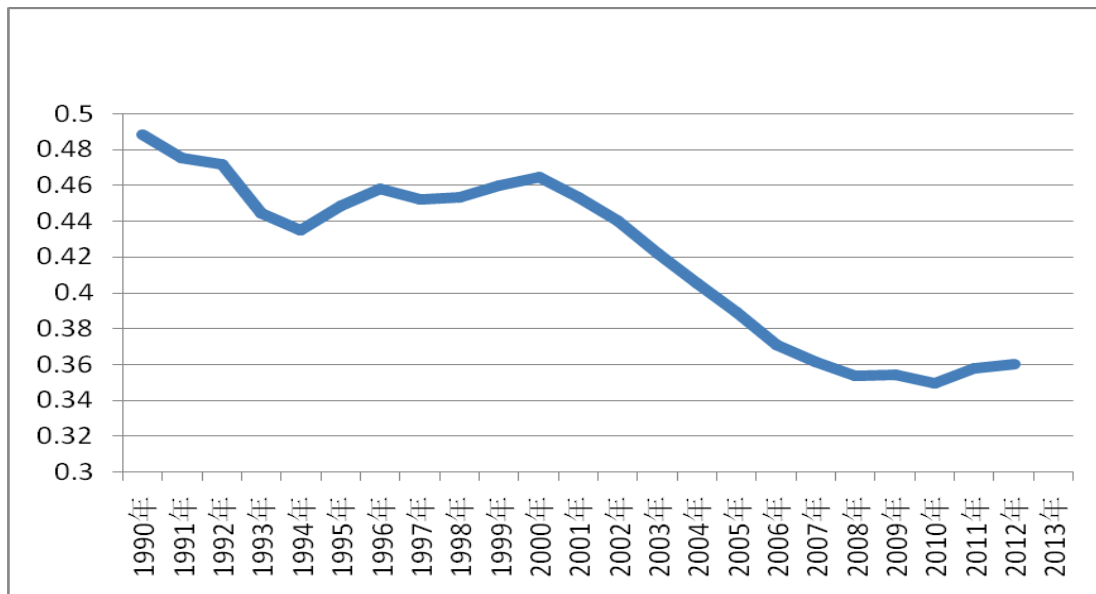
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国民收入中消费份额出现了急剧下降。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00年的62%下降为2010年的48%，十年中下降了14个百分点（见图6）。这是历史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不曾出现的情况。虽然近两年中国国民收入中消费占比略有上升，但是仍处于很低水平上。从消费结构上看，导致消费占比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居民消费占比的快速下降（见图7）。在全社会总消费中，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所占比例出现了一升一降的情形，前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22%上升到2012年的27%，后者却从78%下降到73%。而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所占比例呈稳定上升趋势，而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在全社会总消费中所占份额上升了近1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所占份额却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见图8）。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城镇化过程引致的城镇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的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

图6 中国消费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收入核算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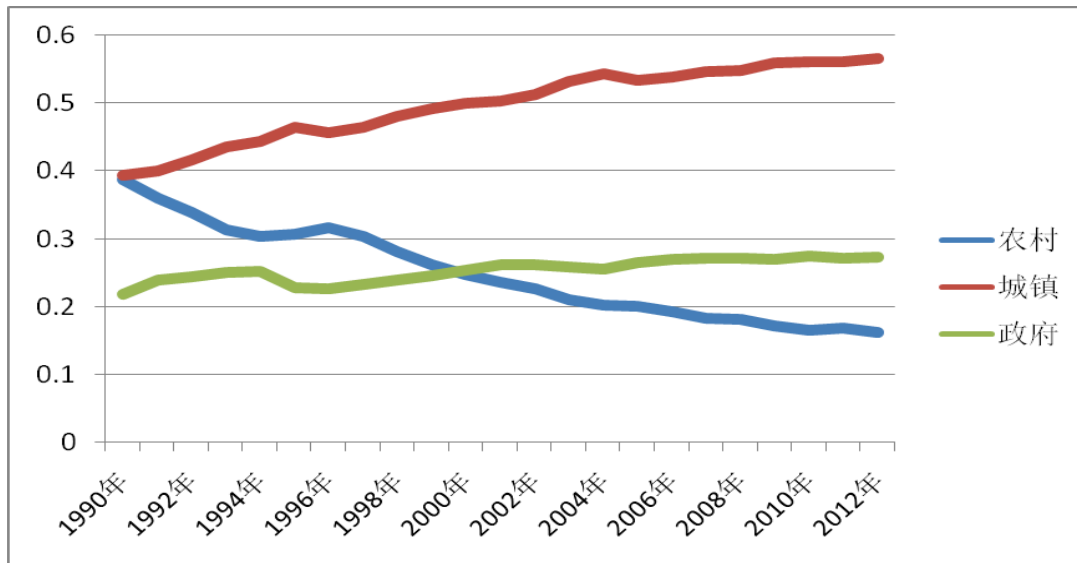
图 7: 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收入核算数据绘制。

图 8: 城镇,农村居民和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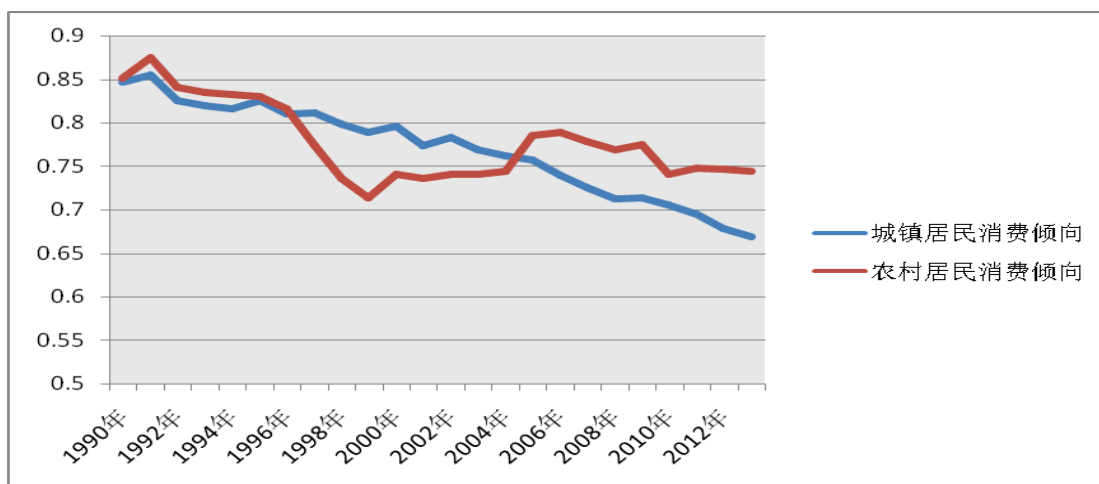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收入核算数据绘制。

图 9 是 1990 年以来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该图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其中居民消费倾向是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从中不难看出，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 1990 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 85%，然后开始一路下降，到了 2012 年为 67%，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不同于城镇居民，在上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从 2000 年开始处于一种相对稳定而略有回升的状态。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更多地反映了农村收入增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90 年代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急剧下降（10 年时间降幅高达近 15 个百分点），一是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民收入的缓慢增加，二是反映了农民税费负担的急剧增加，三是反映了公共服务市场化导致了农民额外负担的增加。从 2000 年开始，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在一段时期内有所回升，是因为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出现了较快增长，加上免除农业税，取消农民缴费，实行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后来实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这些政策措施一方面加快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减少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提高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两方面的效应的共同结果就是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稳定和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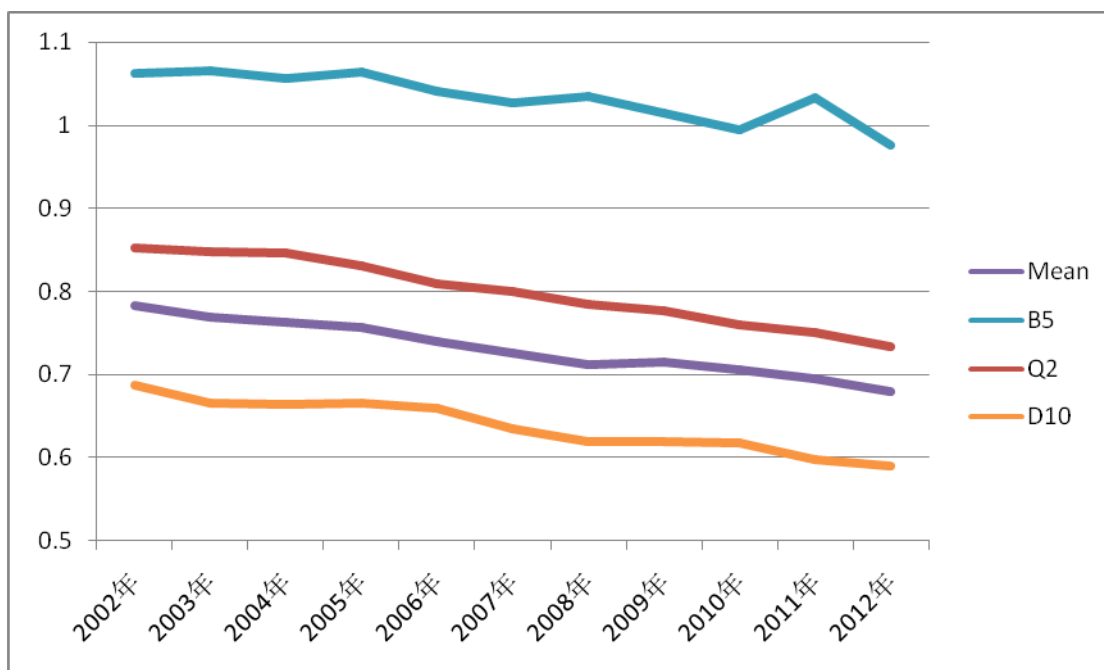
图 9: 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住户调查数据绘制。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以城镇居民为例，不同收入组人群具有不同的平均消费倾向，而高收入组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往往会低于低收入人群。图 10 给出了 2002 年至 2012 年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首先，正如消费理论所预测的，不管是高收入组人群，还是低收入组人群，其平均消费倾向都会随着其收入增加而下降。如图 7 所示，在 2002 年至 2012 年期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收入最低的 5% 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8 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 10% 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10 个百分点。其次，高收入组人群与低收入组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远低于后者。如图 7 所示，收入最低的 5% 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比收入最高的 10% 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高出近 40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将收入最高的 10% 居民的收入中 10000 元转移给收入最低的 5% 居民，那么社会消费额将会增加 4000 元。

图 10：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住户调查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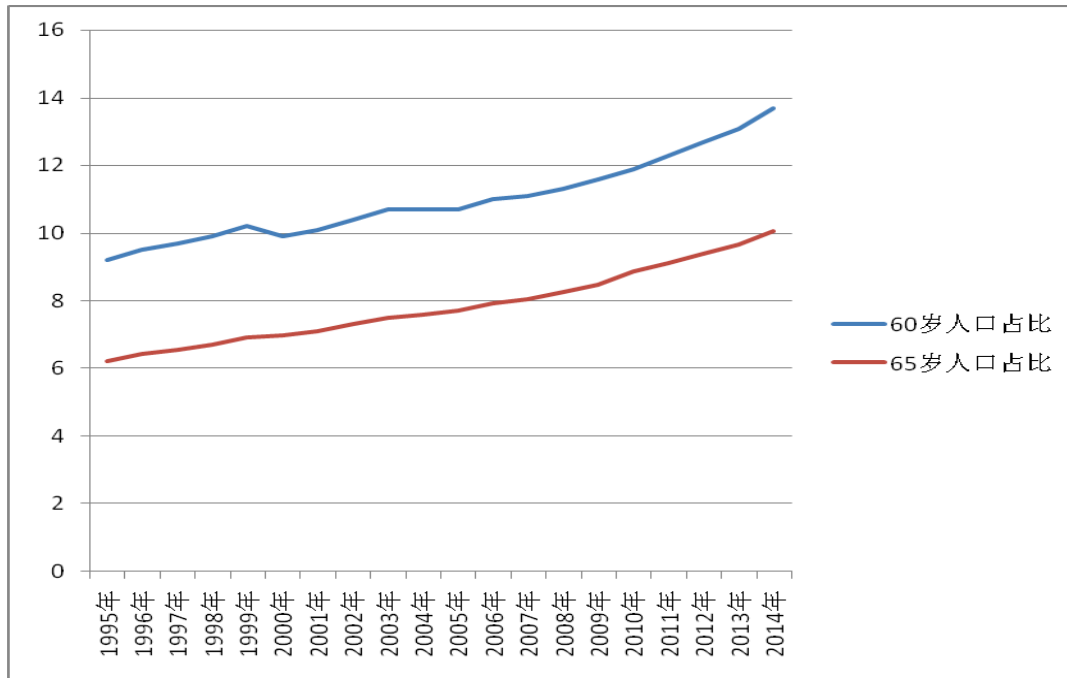
注释：Mean=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B5=收入最低的5%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Q2=收入次低的20%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D10=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

## 5. 不断加速的老龄化

在过去20年中中国老龄化过程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特别近几年老龄化出现了加速进程。如图11所示，在1995-2014年期间，65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6.2%上升到10.1%，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60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9.2%上升到13.7%，上升了4.5个百分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老龄化的加速过程，如在1995-2009年期间（14年）60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上升了2.4个百分点，而且后来的5年中这一比例则上升了2.1个百分点。不言而喻，老龄化加速到来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且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用于养老的部分不断增加。它不仅带来养老金收支不平衡问题，带来代际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带来资本积累不足以及经济增长减速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老龄化也有地域上的差异。从相关的数据来看，农村的老龄化进程快于城镇，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纷纷流向城镇就业。农村老人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加上其前往城镇就业的子女在城镇不稳定的就业生活状态，难以前往城镇与其子女团聚。他们成为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难题。

图 11：中国老龄化进程（老龄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中数据计算和绘制。

### 三、 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

社会保障或者说社会福利，具有保险、扶贫、收入再分配和消费平滑的功能。当今中国，社会保障在刺激国内需求、提高家庭消费倾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而且社会保障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缓解贫困，维持社会稳定都具有明显的功能。

#### 1、 社会保障的六个功能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Barr, 2001, 2004; Barr 和 Diamond, 2008）普遍认为的社会保障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保险。社会保障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保险通常指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转移项目（Feldstein, 2005）。对于中国，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收入流动和健康的不确定，社会保障对降低这些风险发挥重要作用。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在这方面提供了较好的例子。社会保险不同于私人保险的是，它具有强制性，需要政府更多的干预和责任，以避免工作搜寻中的障碍和医疗资源使用的无效率。设计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供最优的保险和激励组合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根据自身情况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不是一个例外（Feldstein, 2005, Barr 2004; Barr 和 Diamond, 2008）。

(2) 扶贫。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没有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穷人很难脱离贫困。现代贫困理论也指出，贫困本身容易产生贫困，当贫困人口陷入贫困陷阱时会导致更多的贫困（Bowles 等，2006）。在缺乏公共服务的情况下，贫困、文盲和（或）疾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Knight 等（2009）提供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义务教育辍学率高于条件较好的家庭，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获得具有较高报酬的非农就业和体面工作的机会也较少。随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过去十年的持续减少，贫困的结构已发生了显著改变。其中一个特点是，农村人口中由于疾病和残疾导致贫困的比率增加。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新千年初期开始广泛实施，在扶贫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但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却不明显（李实、杨穗，2009）。根据城镇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经验，中国政府在 2007 年开始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农村，但是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地区。我们相信，中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扶贫方面是一项有效的措施，也是对传统的开发式扶贫措施，如通过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来降低贫困的一个补充完善。<sup>6</sup>

(3) 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在制度设计中，再分配功能是否应优先考虑仍是有争论的（Feldstein，2005）。理论上，社会保障有直接和间接的再分配作用，直接的作用不是那么明显，但间接作用不容忽视。中国城镇的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很小，因为养老金与之前的工资密切挂钩，但毫无疑问，养老保险制度对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有间接作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这一间接作用将变得更显著。长期来看，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对收入再分配的间接作用将更大。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对缩小同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关重要。过去十年，持续上升的教育回报率对缩小中国城镇地区工资差距的作用日益增加，但城镇职工之间教育程度的显著不平等又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李实，2008）。同时，社会保障和福利，如收入补贴计划和免费或减免的教育，当低收入人群获得这些制度的大部分利益时，通常对收入再分配产生积极作用。

(4) 平滑消费。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长期来看对个人的消费平滑有明显作用，也被称为存钱罐功能（Barr，2004）。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经常经历由于失业、产品价格波动、疾病和自然灾害而导致的收入波动。收入波动是农村人口陷入暂时性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Whalley 和 Yue，2009）。收入波动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波动，因此，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低保等收入救济计划，对家庭消费平滑具有强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

(5) 刺激消费。长期来看，对于像中国这样消费倾向持续降低的国家，这

---

<sup>6</sup> 见关于低保对江西农村贫困降低的补充作用的详细讨论，文章名为《农村低保与扶贫：作用雷同还是互补》。 <http://www.fupin.gansu.gov.cn/zwzx/1181004710d3661.html>

一目标尤其重要。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出口行业受到严重打击，2008年底出口份额大幅降低。最近，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呼吁政府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以降低消费者的风险和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不确定性，提高消费倾向（蔡昉、都阳，2009）。虽然没有非常有力的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保障的不足是中国消费倾向降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一些调查指出，中国家庭储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儿童教育、未来的医疗支出和购买住房。<sup>7</sup>

（6）社会稳定器。这也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具有的重要作用。许多研究指出，犯罪和社会冲突与失业、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困高度相关（Fajnzylber 等，1998；2002）。对穷人和失业者没有社会保障或保障不力的国家，这一相关度更高，中国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因此，对于中国，为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扩大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非常重要，这也有助于为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创造和谐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 2、三大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保障未来十年的战略目标以及与总体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作为一个合适的制度，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也被认为是三个基本原则。首先，完全的覆盖，全部人口，无论老少、农村还是城镇居民、正规还是非正规部门的工人、雇主还是雇员，都应包括在内。其次，可携性，个人缴纳社会保障项目，其受保资格随着工作的变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具有可携性。第三，可持续性，社会保障水平的标准不能维持在超出政府财政能力的水平之外，但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普遍认为是低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CDRF，2009）。

---

<sup>7</sup> 见新华网“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的讨论

#### 四、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效果。本文利用了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收集的 2013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首先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估计，然后对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养老，医疗，住房，低保等）所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测算，从而可以评价其收入再分配效果。

表 1 是利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课题组于 2013 年收集的全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 2013），计算了税费和转移支付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计算的规则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家庭住户可支配收入的核算方法，即

**可支配收入 = 市场收入 - 税费 + 转移收入（公共转移收入 + 私人转移收入）**

在估计税费和转移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时，采用基尼系数来计算收入差距，分别计算市场收入分配（通常称为初次分配），扣除税费后，加上转移收入后的基尼系数。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的差额被看作为再分配效应。

表 1：中国税费与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 2013 年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变动	基尼系数的变动率 (%)
市场收入	0.51740		
- 税费	0.51767	0.00027	0.05
+ 公共转移收入	0.47203	-0.04564	-8.82
+ 私人转移收入	0.44135	-0.03069	-5.93
=可支配收入	0.44135		

来源：根据 2013 年 CHIP 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表 1 显示，2013 年全国居民的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约为 0.52，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 0.44。由此可见，经过税费调节和转移支付的作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8 个百分点。换句话说，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市场收入差距，经过再分配过程后，下降了 14.7%。如果分别来看几项再分配手段，税费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差距，而且略微扩大了收入差距；公共转移收入使得市场收入差距下降了近 9 个百分点，是三项中最有力的调节手段；私人转移收入使得市场收入差距下降近 6 个百分点，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调节手段。

表 2 显示了税费和公共转移收入细项分别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税费分

项中，个人所得税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其作用非常有限，使得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下降不足 1%。几项社会保障缴费，除了失业保险缴费具有微弱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外，其它几项社会保障缴费都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如养老保险缴费和医疗保险缴费分别使得市场收入差距扩大了 0.13%和 0.24%。这意味着社会保险缴费具有一定的累退性（Regressive）。虽然有些社会保险缴费（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与工资等比例的，但是放在家庭收入来看，这些缴费具有明显的累退性，即高收入家庭的缴费占其收入的比例小于低收入家庭。

在公共转移收入中，所有的项目都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但是其效应的大小有所不同。城镇职工的离退休金收入具有较明显的再分配效应，它使得市场收入差距缩小了近 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收入，其它养老保险收入也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其程度小了很多。三项的综合效应只是使得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不足 1.5%。城乡低保，社会救济，以及政策性补助，可以看作为社会福利项目，它们也是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其效应并不明显。如表 2 所示，城乡低保，社会救济，和政策性补助的综合效应使得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不足 1%。最后，各种农业补贴（包括种粮补贴）也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导致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 0.61%。由于这部分补贴主要是农村居民获得的，它对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

表 2：中国税费和公共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2013 年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变动	基尼系数的变动率 (%)
<b>市场收入</b>	<b>0.51740</b>		
<b>- 税、费</b>	<b>0.51767</b>	<b>0.00027</b>	<b>0.05</b>
- 养老保险费	0.51808	0.00068	0.13
- 医疗保险费	0.51931	0.00123	0.24
- 失业保险费	0.51905	-0.00025	-0.05
- 其它缴费	0.51914	0.00008	0.02
- 个人所得税	0.51767	-0.00147	-0.28
<b>+ 公共转移收入</b>	<b>0.47203</b>	<b>-0.04564</b>	<b>-8.82</b>
+ 离退休金	0.48691	-0.03076	-5.95
+ 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	0.48366	-0.00325	-0.63
+ 农村居民养老金收入	0.48098	-0.00269	-0.52
+ 其它养老收入	0.48040	-0.00058	-0.11



+ 低保金	0.47848	-0.00192	-0.37
+ 社会救济收入	0.47741	-0.00107	-0.21
+ 政策性生活补贴	0.47657	-0.00084	-0.16
+ 农村医疗报销款	0.47568	-0.00090	-0.17
+ 从政府和社会组织获得的实物收入和服务	0.47519	-0.00049	-0.09
+ 各种农业补贴	0.47203	-0.00315	-0.61
<b>+ 私人转移收入</b>	<b>0.44135</b>	<b>-0.03069</b>	<b>-5.93</b>
<b>可支配收入</b>	<b>0.44135</b>		

来源：根据 2013 年 CHIP 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各种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对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起到多大的再分配作用呢？对此，我们需要分别考察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前后市场收入差距的变化。表 3 是城镇居民市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变化与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的关系。从表 3 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2013 年城镇居民的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 0.453，经过税费和转移收入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 0.349。如果不包括私人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经过收入再分配政策调整之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9.5 个百分点，或者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21%。应该说，现行的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如果进一步考察税费细项和转移性收入的细项的效应，我们不难发现税费的效应是很小的，而且也是扩大收入差距的。这主要因为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的缴纳具有一定的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个人所得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只是由于其作用有限，不足以抵消两项保险费的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表 3：中国城镇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的再分配效应，2013 年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变动	基尼系数的变动率 (%)
<b>市场收入</b>	<b>0.45295</b>		
<b>- 税、费</b>	<b>0.45502</b>	<b>0.00206</b>	<b>0.45</b>
- 养老保险费	0.45574	0.00278	0.61
- 医疗保险费	0.45690	0.00116	0.26
- 失业保险费	0.45683	-0.00007	-0.01
- 其它缴费	0.45698	0.00015	0.03

- 个人所得税	0.45502	-0.00197	-0.43
<b>+ 公共转移收入</b>	<b>0.35745</b>	<b>-0.09757</b>	<b>-21.54</b>
+ 离退休金	0.36813	-0.08689	-19.18
+ 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	0.36101	-0.00712	-1.57
+ 农村居民养老金收入	0.36044	-0.00057	-0.13
+ 其它养老收入	0.35989	-0.00055	-0.12
+ 低保金	0.35827	-0.00162	-0.36
+ 社会救济收入	0.35769	-0.00058	-0.13
+ 政策性生活补贴	0.35733	-0.00036	-0.08
+ 农村医疗报销款	0.35778	0.00045	0.10
+ 从政府和社会组织获得的实物收入和服务	0.35762	-0.00017	-0.03
+ 各种农业补贴	0.35745	-0.00017	-0.03
<b>+ 私人转移收入</b>	<b>0.34868</b>	<b>-0.00877</b>	<b>-1.94</b>
<b>可支配收入</b>	<b>0.34868</b>		

来源：根据 2013 年 CHIP 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在转移性收入中，对收入分配带来最大影响的是离退休金。如表 3 所示，城镇职工离退休金导致城镇居民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 19.2%，另外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金收入带来了城镇居民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 1.6%。除此之外，其它的转移支付项目所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都是非常有限的，使得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不到 1%。

表 4 显示了中国农村税费和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总起来讲，农村社会再分配的效应明显地小于城镇，税费和公共转移收入只是使得农村居民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4.9% 而城镇为 21%。与城镇居民的情况相似的方面是农村居民负担的税费不仅没有减少收入差距，反而是扩大收入差距。税费的再分配作用使得农村居民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 1.23%（见表 4）。由于农村养老制度发展严重滞后，新农保制度建立后，农村老人获得的养老补贴所占农户收入比重还是很低，因而农户收到的养老金收入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非常有限，只是使得农户市场收入差距缩小了 1%。当然，农村的转移性收入的种类要多于城镇，除了低保金收入外，农村居民还收到其它补贴，如种粮补贴等。这些转移收入对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起到一定的作用。如表 4 所示，各种农业补贴使得农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缩小了约 1.34%。

还应该注意的是农村居民的私人转移性收入所起到的再分配作用。在农村私人转移收入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寄回带回的收入。在 2013 年私

人转移性收入使得农村居民的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12.24%，其作用相当于公共转移性收入的两倍。当然，私人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作用与公共转移性收入之间具有较强的替代性。也就是说，公共转移收入的增加会挤出私人转移性收入。

表 4：中国农村税费和社会保障项目的再分配效应，2013 年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变动	基尼系数的变动率 (%)
<b>市场收入</b>	<b>0.46435</b>		
<b>- 税、费</b>	<b>0.47005</b>	<b>0.00570</b>	<b>1.23</b>
- 养老保险费	0.46684	0.00250	0.54
- 医疗保险费	0.47004	0.00320	0.69
- 失业保险费	0.46998	-0.00005	0.01
- 其它缴费	0.47013	0.00015	-0.03
- 个人所得税	0.47005	-0.00009	-0.02
<b>+ 公共转移收入</b>	<b>0.44161</b>	<b>-0.02843</b>	<b>-6.12</b>
+ 离退休金	0.46452	-0.00552	-1.19
+ 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	0.46330	-0.00123	-0.26
+ 农村居民养老金收入	0.45838	-0.00492	-1.06
+ 其它养老收入	0.45781	-0.00057	-0.12
+ 低保金	0.45474	-0.00306	-0.46
+ 社会救济收入	0.45288	-0.00186	-0.40
+ 政策性生活补贴	0.45127	-0.00160	-0.36
+ 农村医疗报销款	0.44864	-0.00263	-0.57
+ 从政府和社会组织获得的实物收入和服务	0.44781	-0.00083	-0.18
+ 各种农业补贴	0.44161	-0.00620	-1.34
<b>+ 私人转移收入</b>	<b>0.38479</b>	<b>-0.05683</b>	<b>-12.24</b>
<b>可支配收入</b>	<b>0.38479</b>		

来源：根据 2013 年 CHIP 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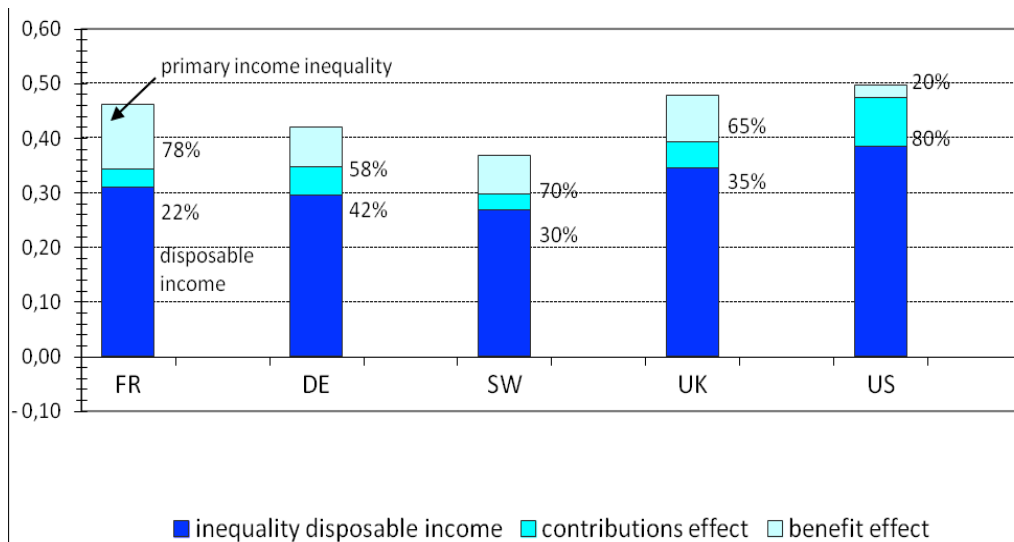
## 五、 国际比较:中国与欧洲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体制和机制仍处于不断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因而，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的

再分配功能仍显偏弱。

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和西欧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已具有百年历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它对于减少不平等，缓解贫困，稳定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它会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和带来严重的社会负担。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欧洲国家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引入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减少过度保障和福利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不断改革中的欧洲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仍具有很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图 12：欧洲四国与美国的社会保障福利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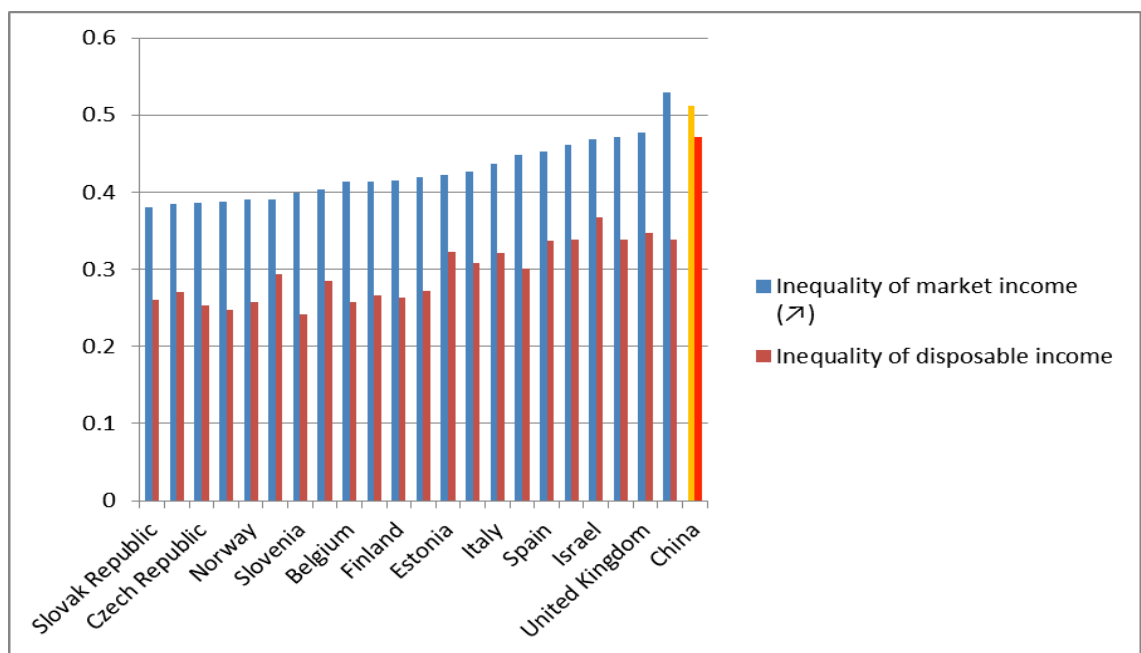
来源：Jean- Yves Hocquet (2016) . Relation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in Europe: Social Protection and Employment “Partnership or Rivalry”. Report of EU-China Social Protection Reform Project.

社会保障和福利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缴费（contribution），二是公共转移性收入。由于缴费类似于个人所得税，具有一定的累进性，即收入越高，缴费越多，因而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公共转移性收入体现在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上，往往是低收入家庭会获得更多的转移性收入，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图 12 是欧洲四国与美国社会保障缴费和收入产生的收入分配的影响。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的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都是较大的，除了瑞典外，其他四国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 0.4，美国和英国接近 0.5。经过社保缴费和转移支付后，可支配收入差距都有

较大幅度的下降，如丹麦的收入差距由 0.42 下降为 0.3 以下，英国由 0.47 下降为 0.34。图 12 还显示了社保缴费和转移支付的不同影响。相对于美国来说，欧洲国家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大于社保缴费的影响，比如法国的转移性收入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占社会保障全部效应的 78%，而缴费的效应只占 22%。相比而言，美国的转移性收入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占社会保障全部效应的 20%，而缴费的效应只占 80%。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更相似于欧洲国家，社保缴费发挥的再分配作用非常有限，而公共转移支付的作用更强一些。

如前所述，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所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不大，只是使得市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略有下降。那么，相比而言，欧洲国家又是什么情况？图 13 显示了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难看出，表中的一些欧洲国家都显示了市场收入（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再分配）的基尼系数之间较大的差别，后者明显低于前者。这意味着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内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起到了明显的调节作用，使得收入差距较大幅度缩小。相比而论，中国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表明了中国再分配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与中国的差别。英国的市场收入差距甚至还高于中国，经过再分配以后，英国的可支配收入差距有大幅度下降，比中国低了很多（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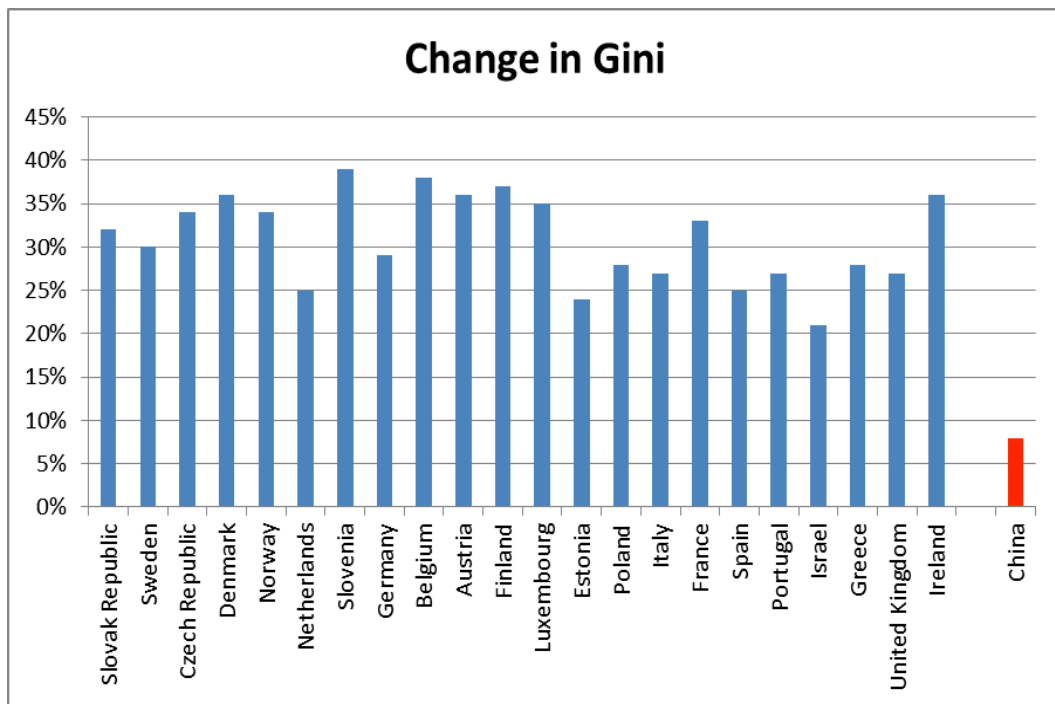
图 13：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中国与欧洲比较



来源：欧洲国家的数据来自于 Jean- Yves Hocquet (2016)，中国的数据由作者根据 2013 年 CHIP 住户调查数据计算。

图 14 更加清晰地显示了中国与欧洲国家在收入再分配效果方面的差异。在欧洲主要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会导致收入差距下降多大幅度呢？如图 14 所示，在 22 个欧洲国家中，经过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调节，收入差距都有明显下降。降幅最小的是以色列，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22%，降幅最大的是斯洛文尼亚，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38%。这些国家的平均降幅在 30%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调节力度非常有限，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仅下降了 8%。

图 14：社会保障和福利导致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



来源：欧洲国家的数据来自于 Jean- Yves Hocquet（2016），中国的数据由作者根据 2013 年 CHIP 住户调查数据计算。

除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中的转移性收入外，欧洲国家的公共服务如免费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同样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表 5 显示了欧洲国家的公共服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基础上，如果加上公共服务的市场价值后，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有明显下降，表明了公共服务缩小了收入差距。有的国家的公共服务的再分配影响较大，如瑞典，有的国家则较少如德国。从分项来看，起到主要影响作用的是公费医疗，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占总体效应的 40-70%。由于中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这里我们无法进行国际比较。然而，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中国公共服务所带来的

收入分配效应不会太大，这主要因为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公共服务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表 5：欧洲国家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

	可支配收入 的基尼系数	可支配收入 +公共服务 价值的基尼 系数	再分配效 应	分项公共服务占总效应的比重				
				健康服务	教育	幼儿照顾	住房	其他
德国	0,300	0,249	-16,9%	61,5%	30,2%	7,1%	1,8%	-0,6%
奥地利	0,270	0,220	-18,5%	56,8%	34,1%	7,6%	1,6%	
西班牙	0,340	0,276	-18,7%	60,4%	32,1%	5,3%	0,5%	1,6%
芬兰	0,270	0,220	-18,7%	57,8%	23,0%	5,3%	0,5%	13,4%
意大利	0,320	0,259	-19,0%	48,4%	41,1%	7,9%	2,6%	
荷兰	0,270	0,218	-19,2%	42,2%	33,3%	9,4%		15,1%
斯洛伐克	0,250	0,200	-19,9%	60,8%	33,7%	3,0%	2,5%	
波兰	0,320	0,256	-20,0%	43,0%	49,5%	5,5%	2,0%	
爱沙尼亚	0,310	0,246	-20,6%	56,3%	31,1%	6,8%	1,9%	3,9%
希腊	0,340	0,270	-20,6%	46,6%	28,6%	2,4%	22,3%	
捷克	0,260	0,206	-20,8%	63,9%	24,5%	7,7%	3,8%	
卢森堡	0,270	0,213	-21,1%	50,7%	36,0%	10,9%	2,4%	8,3%
比利时	0,260	0,204	-21,7%	65,9%	20,3%	6,9%	6,9%	
丹麦	0,250	0,196	-21,8%	45,9%	26,1%	5,0%		22,9%
法国	0,280	0,217	-22,5%	57,8%	25,8%	8,0%	4,9%	3,6%
葡萄牙	0,370	0,286	-22,6%	60,2%	35,4%	4,0%	0,4%	
匈牙利	0,260	0,201	-22,8%	46,1%	36,0%	12,3%		5,7%
英国	0,330	0,254	-22,9%	54,6%	30,6%	3,1%	4,8%	7,0%
爱尔兰	0,320	0,246	-23,2%	53,9%	43,5%	0,4%	2,2%	
瑞典	0,240	0,183	-23,8%	52,1%	23,5%	6,3%	0,4%	17,6%

来源：欧洲国家的数据来自于 Jean- Yves Hocquet (2016)。

## 六、 结论

过去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并没有起到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中国正面临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较大规模的贫困人群、经济增长减速带来的失业压力、大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消费需求不足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

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和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其功能包括保险、扶贫、收入再分配、消费平滑和刺激，以及社会稳定器。

幸运的是，中国各级政府都已经意识到广覆盖、高效率且可持续的新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CDRF，2009；郑，2008）。迄今为止，中国已初步建立起覆盖全部人群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了城乡全部人口。

然而，由于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是碎片化的，城乡实行着不同的制度，城市内部不同就业身份的人群实行不同的制度，制度之间缺少衔接和协调，不同人群为社会保障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从中获得的待遇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待遇不仅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起到逆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居民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是负面的，即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居民从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中获得的公共转移收入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中主要来自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作用。

与欧盟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的作用仍有待于提高。欧盟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幅度地降低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除此之外，欧盟国家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高，也在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未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进程中，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首先，在社会保障缴费上，需要提高缴费的累进性，即缴费要与其收入水平挂钩。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加快推进，尽快并入到企业职工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变现在公务员不缴费的局面。其次，改革现行的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不同人群获得的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再次，需要增加社会福利项目。现行的低保制度需要提高瞄准性，同时需要提高其低保金水平。此外，增加一些针对



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福利项目，如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补贴。最后，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模拟分析，特别对其产生的收入再分配的效应进行模拟分析，为政策的调整和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参考文献

Adelman, I., and Sunding, D., 1987. Economic Poli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1987.

Barr, Nicholas, 2003. Preface to Chinese edition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Beijing: Press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Barr, Nicholas, 2001. *The Welfare State As Piggy Bank: Information, Risk, Uncertainty,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r, Nicholas and Peter Diamond, 2008. Reforming pensions, submitted to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Bowles, Samuel, Steven N. Durlauf and Karla Hoff (eds) (2006).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ng, Quheng and Li Shi, 2008. Wage Structures and Inequality among Local and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A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in the RUMICI workshop in ANU, 10-12 December 2008.

Martin Feldstein, 2005. Rethinking social insurance. NBER, Working Paper 11250.

Fajnzylber, Pablo, Daniel Lederman, and Norman Loayza, 2002. What causes violent crim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46, Issue 7, July 2002, Pages 1323-1357.

Fajnzylber, P., D. Lederman and N. Loayza, 2002, Inequality and Violent Crim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5, 1-39.

Gustafsson, Bjorn, Li Shi and Terry Sicular, 2008. *Income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Jean- Yves Hocquet, 2016. Relation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in Europe: Social Protection and Employment “Partnership or Rivalry”. Report of EU-China Social Protection Reform Project.

Keidel, Albert, 2005. The Economic Basis for Social Unrest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Third European-American Dialogue on China,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y 26-27, 2005.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Keidel\\_Social\\_Unrest.pdf](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Keidel_Social_Unrest.pdf).

Knight, John, Li Shi and Deng Quheng, 2009. “Education and the Poverty Trap in Rural China: Closing the Trap”, to be published in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Li Shi, 2008.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Scenario, Challenges and Public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89. Policy Integration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Liu, Gordon, 2009. Deepening reform of medicare system, development as hard justification, speech in a seminar given in Beijing Unirule Institute, June 22, 2009.

Lum, Thomas, 2006. Social Unrest in China, a report to Congress. May 8, 2006.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416.pdf>.

Peng, James, 2009. China May Face Social Unrest as unemployment Rises, Report Says.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080&sid=aG8JAH3FwkmY&refer=asia>

Riskin, Carl, Zhao Renwei and Li Shi, 2001.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M.E. Sharpe: New York, 2001.

Whalley, John and Ximing Yue, 2009. Rural Income Volatili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doi:10.1093/cesifo/ifp014.

The World Bank, 2009. 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 Agenda: An Assessment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Office, Beijing.

中国社会蓝皮书 2005.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蔡昉, 都阳. 实现就业增长型的经济复苏. 2009. 博客文章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uid=337&type=blog&itemid=539446>.

- 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CDRF）.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 杜萍.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缺位探究.人口与经济 2009 年增刊：145-146.
- 李实、杨穗. 我国城市低保政策对收入分配与贫困的影响作用.中国人口科学. 2009.5.
- 林晓洁.建立外来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分析.人口与经济 2006 .1：  
75-79
- 刘国恩. 深化国家医改、发展是硬道理.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讨会报告.  
2009.6.22.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 2008 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统计  
公报. 2009
- 国家统计局（NBS）. 2008 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9.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
- 宋其超，郭雪剑. 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国财政 2008.15：36-37
- 徐月宾，张秀兰. 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东岳论丛 2009.2：  
32-37
- 游春. 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存在问题与解决途径. 上海保险 2009.1：15-18
-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中国  
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15.中国财经出版社。
- 赵慧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及问题.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8.5：  
54-59
- 赵人伟、赖德胜、魏众等.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保障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 30 年. 人民出版社. 2008.